【义乌发展经验研究专题】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义乌经验与启示*

徐梦周 郑兆峰

摘 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是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县域经济的综合性、融合性与区域性特征决定了其发展包含统筹推进特色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与区域全面开放的核心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在遵循共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实际、错位发展，以市场与政府协同联动为动力塑造形成比较优势。四十余年来，义乌始终坚持以特色产业夯实根基、以城乡融合厚植底色、以全面开放拓展空间，依托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活力，实现了从农业贫困县到经济强县的跨越式转变。义乌实践对新阶段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应聚焦特色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在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塑造开放新优势，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发挥优势与参与区域分工中走好差异化道路。

关键词：县域经济；因地制宜；义乌经验；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43-11 **收稿日期**：2026-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时代区域创新系统驱动机制、绩效影响与优化路径研究”(24FGLB07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数字时代区域创新系统的演进动力、形态特征与优化对策研究”(25QNYC001ZD)。

作者简介：徐梦周，女，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杭州 311121)。

郑兆峰，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讲师(杭州 311121)。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县域经济总量已达54万亿元，占全国GDP比重近40%，影响着超过7亿人口的生产生活[①]。然而，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县域依托特色产业或区位优势实现率先发展，特别是60余个GDP千亿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佼佼者[②]。但更多县域面临产业结构单一、要素流通不畅、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难以为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供有力支撑(魏后凯，2024)。研究显示，2010—2020年我国近七成县域常住人口在减少，大多流向城市群、都市圈和沿海大城市，其中约15.6%的县域人口减少高达20%(吴康等，2023)。因而，对于资源禀赋有限、区位优势并不突出的广大县域而言，如何突破产业基础薄弱、要素吸引能力不足和新旧动能转换困难等约束，依托自身比较优势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义乌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发展由“鸡毛换糖”的货郎担起步，从浙江中部典型的农业贫困

县、资源匮乏县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更体现在产业扩张过程中带动城乡要素流动，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推进，为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截至2025年，义乌城镇居民收入达到101816元，连续多年领跑全国县域；农村居民收入达到5796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低于全国和浙江全省水平。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明“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③]。时隔二十年，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④]。

因此，系统解构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创新实践，对于推动新时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深入把握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经验，本研究从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与核心要求、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机制出发，明确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科学内涵，为后续分析义乌的实践奠定清晰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义乌从一个传统的贫困农业县稳步发展成为稳居全国前列的经济强县的实践历程，分阶段呈现义乌在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开放发展三个核心维度的演进路径，梳理不同发展阶段义乌根据自身实际调整发展战略的完整脉络，进而归纳提炼主要经验。最后，结合“十五五”时期县域经济发展趋势提出实践启示，以期为其他县域立足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科学内涵

因地制宜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既要遵循县域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充分考虑不同县域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方面的差异，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机制。其科学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县域经济发展特征与核心要求，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逻辑起点；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逻辑，蕴含着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的有机统一；三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动力机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作用培育持续竞争优势，以此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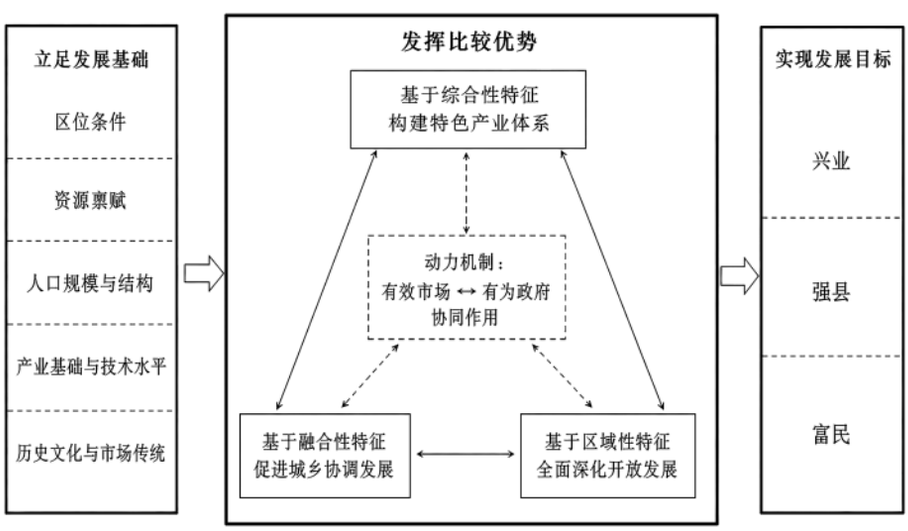

图1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科学内涵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县域经济发展特征与核心要求

县域作为行政区划限定的实体空间，包含村庄社区、乡镇以及县城等多层级空间单元。相较于省份、地级市等宏观尺度以及乡镇、村庄等微观尺度，县域具有城乡联系紧密、地域范围适中、文化同质性强等特点（崔凯，2025）。作为以县域为空间尺度的基本区域经济形态，县域经济基于城乡分工互补关系和经济循环而形成，兼具鲜明的综合性、融合

性与区域性特征(涂圣伟,2026)。

首先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指县域经济集三次产业、生产和非生产性活动、经营与管理于一体,是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其中,产业是连接这些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县域经济的可持续运行有赖于产业之间形成稳定的分工协作和投入产出联系。但受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市场容量等条件约束,县域难以像大中城市一样构建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这就决定了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立足自身优势选择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并以主导产业为牵引推动上下游延伸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其次是县域经济的融合性。县域作为覆盖城乡两类空间的独立行政单元,天然承担着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枢纽功能。相应地,县域经济发展也兼具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双重属性。这意味着,县域经济发展决不能割裂城乡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主动在城乡之间搭建起要素自由流通、产业协同联动、市场高度一体、公共服务共享的坚实桥梁,实现城市经济系统与乡村经济系统的有效衔接与融合发展。

最后是县域经济的区域性。县域经济发展与地理空间、区域条件紧密相连。相比于大中城市,多数县域地理面积小、区位条件差、开放程度不高,导致其在吸引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要素方面面临较大挑战(蔡之兵,2025)。因此,发展县域经济需要主动融入区域分工体系和更大范围市场,通过承接产业分工、扩大市场联系和吸引外部要素,在开放发展中拓展比较优势的实现空间。

(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内在逻辑

唯物辩证法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既要遵循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要求,更要立足自身实际锚定差异化发展方向,构建形成比较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要遵循县域经济发展的共性要求,即围绕"兴业、强县、富民"目标,立足县域经济综合性、融合性、区域性特征,推进特色产业体系构建、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以及通过开放发展获取要素。在三大目标中,兴业是核心基础,只有培育起符合本地比较优势、具备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才能为县域创造稳定的就业岗位、持续的财政收入和充足的发展动力;强县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产业兴旺最终要转化为县域综合实力的提升;而富民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不断提高县域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本地居民。

此外,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在于立足发展基础、形成比较优势。不同县域的自然条件、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经济基础各有不同。部分县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部分县域依托区位优势形成商贸基础,还有部分县域资源禀赋匮乏,却拥有浓厚的商贸传统和敢闯敢试的人文氛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同县域之间人口规模差异显著,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常住人口超过200万人,而最少的不足万人,足见其内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了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立足发展基础和现实条件,不能搞"一刀切",套用同一模板。我国地域辽阔,县域数量众多,县域之间的产业选择与竞争对整体经济发展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也绝不是推动孤立发展或倡导"各自为战"。发展县域经济"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5]。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所强调的"错位发展",突出发展定位的特色化与发展路径的差异化,强调县域在明确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主动融入更大范围的产业分工网络,在对接外部资源、参与开放竞争中不断强化自身特色优势,进而将不同县域分散的比较优势凝聚为整体竞争优势,实现"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良好格局。

(三)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动力机制

政府与市场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决定发展方向与发展质量的两大核心主体。相较于产业体系完善、要素禀赋充足的大中城市,县域自身空间范围有限,区域内部产业链、市场网络层级更简单,这也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个体经营者等各类市场主体的联系更加直接和紧密,对本地产业发展基础、各类经营主体的实际发展诉求,以及制约本地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更容易形成及时、准确的感知。与此同时,受发展阶段和空间条件限制,多数县域市场容量有限、要素市场发育相对不足,单纯依靠市场自身难以提供足够的发展支撑,无论是交通、水利、

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跨区域产业对接、资源要素协调等事项，都较多依赖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与组织推动。这意味着，对县域经济发展而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尤为重要。一方面，发育完善的县域市场，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信号，依托价格机制引导本地各类经营主体围绕自身比较优势调整生产经营方向，推动特色产业自发集聚。另一方面，县域市场发育不足的先天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主动补位。因地制宜发展逻辑下，地方政府要立足县域发展的实际条件，当好县域发展的规划者、服务者与守护者，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只有两者协同发力才能持续激活县域内生动力。

三、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历程

20世纪80年代初的义乌，是浙江中部一个典型的“七山二水一分田”贫困农业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经过四十多年发展，义乌不仅跻身全国十强县，成长为实力突出的经济强县，更以“世界小商品之都”闻名全球，走出了一条资源匮乏型县域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独特路径。回顾四十余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义乌始终立足自身实际，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条件与需求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在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和开放发展三个方面持续探索，逐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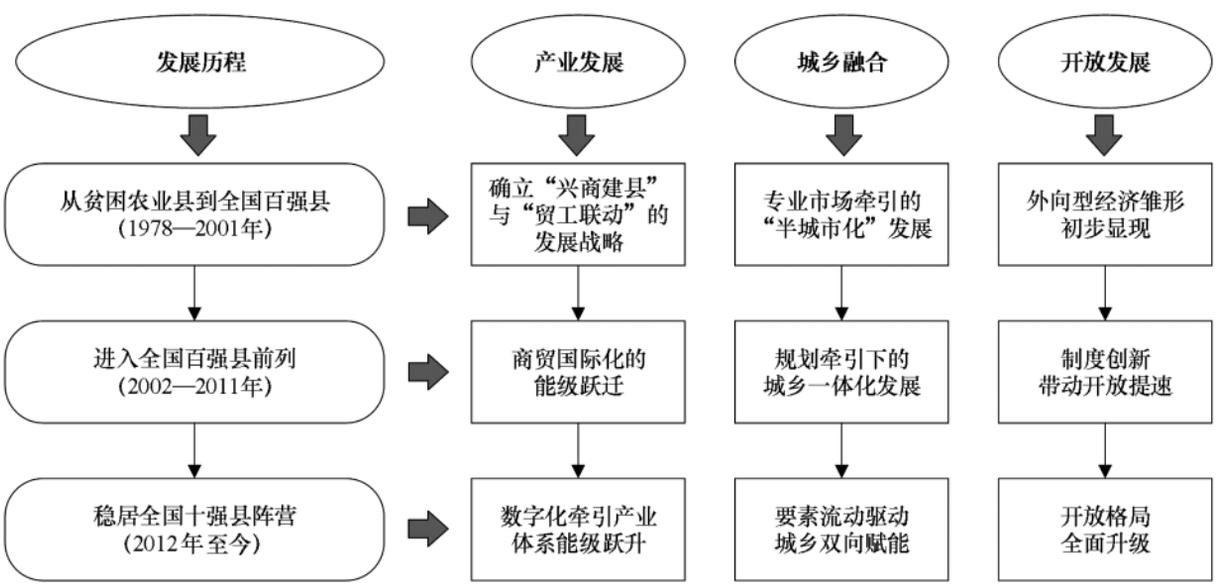

图2 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阶段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1978—2001年：从贫困农业县到全国百强县

在这一阶段，国家层面对县级行政单元发展的战略安排主要隐含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变革和县级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框架之中，尚未将“县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单元进行系统性部署（张凤林，2022）。对义乌而言，这一时期处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奠基阶段，产业发展、城乡互动与开放发展主要依靠基层自发探索与地方政策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推进。随着小商品市场的快速成长和贸易网络的不断拓展，义乌逐渐突破传统农业县的瓶颈约束，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经济单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数据，2001年义乌在全国最发达县域中排名第19位。

1. 产业发展：确立“兴商建县”与“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前，义乌百姓依靠农业经营收益难以维持生计，以“鸡毛换糖”为代表的商品交换活动逐渐发展起来。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意愿，正式开放稠城镇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并提出“四个允许”政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为小商品流通打开了制度空间（陆立军等，2007）。市场开放后，长期被压制的民间商业活力迅速释

放，小商品交易规模快速扩大（刘成斌，2014）。义乌逐渐认识到商贸流通不仅是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更是突破县域发展约束、实现经济跨越的重要抓手。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兴商建县”战略[6]，将商贸业确立为县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在这一战略引领下，义乌持续完善市场体系建设。1984年底，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建成，相较于第一代以露天摊位、简易棚架为主要形式的集市交易模式，第二代市场实现了集中化、规模化、规范化运营，不仅扩大了商户容量，还首次将工商、税务、银行等服务机构引入市场，形成了集商品展示、交易、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市场形态。到1992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面积达到约8万平方米，设有营业摊位超过7000个，市场成交额超过10亿元[7]。1993年，义乌提出“贸工联动”战略，对创造、创新产品的制造业给予优惠政策，加以激励扶持。在该战略推动下，义乌贸易产业逐步向生产制造环节延伸，通过“前店后厂”“产销结合”等方式催生一批小商品产业集群，袜业、饰品、玩具等产业快速成长。商贸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推动义乌县域经济实力快速提升。2001年，义乌GDP为136亿元，市场商品成交额241亿元，其中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到212亿元，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县向以商贸流通和特色制造业为支撑的经济强县的转变[8]。

2.城乡融合：专业市场牵引的“半城市化”发展

专业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义乌产业结构转型，也深刻改变了城乡空间格局和城乡关系。1982年义乌湖清门市场开放后，周边自发形成了商业集聚，城区开始突破原有格局向外延伸。随着市场不断易址迭代，城市骨架逐步拉开，城区面积从80年代初的2.8平方公里扩展至90年代初的10平方公里，到1999年进一步扩大到15.4平方公里，城市化率达到近40%[9]。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市场的辐射效应也逐步向乡村延伸。一方面，为了使农村劳动力能够便捷地向市场流通领域转移，1987年义乌全县实现乡乡通公路，1991年城区通往各乡镇的公路全面硬化并开通城乡公交。另一方面，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包装、组装、加工等配套需求逐渐向周边乡村延伸，部分农村居民利用家庭住房、闲置空间开展简单加工和商品配套服务，农村开始由传统农业生产空间转变为服务市场发展的辅助空间。这一时期义乌城乡关系的转变主要是市场需求外溢、产业链延伸形成的结果，大批农民“离土不离乡”式就业，白天在市场或工厂务工，晚上回到农村居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半城市化”模式。

3.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雏形初步显现

随着小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大，义乌与全国的连接日益紧密。一方面，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企业和经营主体不断进入义乌市场，提升了市场集聚能力。另一方面，义乌商户依托市场形成的交易网络，将汇聚于此的商品销往全国各地，并将市场需求和消费信息反馈给生产环节，逐步形成“买全国货、卖全国货”的开放格局。1992年8月，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命名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从区域性集散中心升级为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心，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半径大幅提升。市场规模的扩大也推动了义乌交通和物流条件的改善。1991年，义乌机场正式开通民航业务，先后开通义乌至广州、厦门等航线，进一步加强了义乌与国内重要城市之间的联系[10]。与此同时，铁路、公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围绕小商品贸易发展的托运、仓储、货运代理等物流服务逐步兴起，为义乌商品向全国流通提供了保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化以及义乌小商品市场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境外采购商进入义乌寻找商品资源。义乌商户凭借灵活的经营方式和对小商品市场的敏锐把握，逐步从国内贸易拓展至出口贸易。为扩大国际影响力，义乌通过展会平台主动对接海外市场。1995年，中国义乌小商品博览会创办，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和贸易商参与，为义乌小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渠道。此后，义乌市场的国际采购功能逐步增强，小商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形成以市场交易为基础、以外贸经营主体为纽带的国际贸易联系。

（二）2002—2011年：进入全国百强县前列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自此，我国正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阶段（陈锡文，2024）。县域被赋予连接城市与农村、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功能，成为推动工业化成果向农村延伸的重要空间载体（钟苏娟等，2026）。这一时期的义乌迎来了我国加入WTO的重大发展机会，国际化成为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主要导向。2002年，义乌将城市发展目标从“商贸名城”调整为“国际性商贸城

市”，开启了商贸能级跃升与城市功能升级的全新探索。2011年，义乌GDP达到726亿元，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列。与此同时，根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义乌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排名中跃居第8位，综合实力进一步凸显[11]。

1.产业发展：商贸国际化的能级跃迁

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义乌依托长期积累的市场优势，推动专业市场向国际化贸易平台转型。在“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发展目标的引领下，义乌不断推进专业市场升级改造。2002年，国际商贸城一区建成投用。此后，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市场陆续建成开放，市场经营空间持续扩大，交易环境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围绕境外采购需求，义乌逐步引入翻译、货代、报关、金融等国际贸易服务，提升市场服务全球采购商和贸易主体的能力，使之成为汇聚国际采购需求、连接全球供应网络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义乌通过举办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国际化展会平台，加强与全球采购商的联系，提升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市场国际化进程也推动了制造业发展模式的转变。随着国际采购规模不断扩大，义乌制造业开始更加主动地适应国际市场需求，依托“贸工联动”形成的产业基础，推动生产企业围绕海外消费趋势、产品标准和贸易要求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大量市场经营主体向生产环节延伸，特色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市场需求引导生产、以贸易扩张带动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商贸优势与制造优势不断融合，使义乌逐步构建起面向国际市场的小商品产业体系。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是义乌由全国性商品流通中心向国际贸易平台跃升的重要阶段。市场国际化提升了义乌配置全球资源、连接国际需求的能力，产业国际化增强了本地制造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2.城乡融合：规划牵引下的一体化发展

经过前一阶段的“半城市化”发展，义乌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农村人口、产业和土地要素也逐步融入市场发展体系，但以市场自发扩张为主的城乡融合模式也面临空间布局分散、城乡差距拉大等问题。随着国家层面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义乌开始由市场驱动下的城乡自然融合转向政府规划引领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2002年起，义乌每年拿出1亿元专项资金开展以“道路硬化、卫生洁化、路灯亮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为主要内容的“小五化”建设。2003年7月，义乌出台国内首个县级市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提出“四个区、三步走、二十年、一体化”的总体发展思路，全面实施以城乡交通、水电、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城乡一体化行动。随着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投入，城乡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空间分割和基本条件差距问题得到明显改善。但此时，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人口流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约束仍然存在。2008年，义乌被浙江确定为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重点探索“土地承包权换保障、宅基地换住房”改革，以破解统筹城乡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小五化”的先行探索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的出台实施，再到省级改革试点的深入推进，义乌在全国县域层面率先完成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建构。这一时期义乌不仅打通了城乡连接的交通网络，还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缓解了“半城市化”阶段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城乡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城乡逐步融合也推动了义乌农村发展方式的转变。2003年以来，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义乌农村商户突破地域限制，将生产加工、商品销售与市场需求直接连接起来，推动农村产业由单一加工环节向生产、销售一体化方向拓展。与前一阶段不同，这一时期义乌农村逐渐由市场发展的外围空间转变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支撑县域产业扩张的重要生产空间。

3.开放发展：制度创新带动开放提速

随着义乌贸易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原有的海关监管体制和出口通关模式已无法满足小商品出口“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的现实需求。彼时，义乌尚未设立海关机构，小商品出口报关须远赴宁波、上海办理。在此背景下，义乌率先从制度通道的搭建入手，以制度创新突破开放困局。2002年10月，金华海关驻义乌办事处成立，实现了小商品出口的属地报关；2005年，海关总署批复同意义乌小商品出口适用“旅游购物”贸易方式，小商品出口手续办理更加便捷；2006年，义乌铁路口岸获批开放，成为浙江省内重要的内陆开放通道之一；2009年，义乌海关正式成立，成为杭州海关首个设在县级市的隶属海关[12]。在完善出口制度的同时，义乌也不断优化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境外资源的吸引能力。随

着国际商贸城的建成和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境外采购商、外贸企业和国际贸易服务机构进入义乌，通过设立采购点、贸易公司等方式参与小商品交易。境外经营主体的集聚不仅扩大了义乌商品出口渠道，也将海外市场需求、产品标准和商业信息带入本地，推动义乌市场逐步走向连接全球供需的贸易平台。随着义乌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单一环节的制度优化已难以满足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义乌开始探索更加系统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义乌成为全国首个获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开始探索更加适应小商品国际贸易特点的新型开放机制。制度创新推动义乌开放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义乌海关监管集装箱57万个标箱，相比2002年增长63倍；全年共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2.57万人次，首次超过宁波、杭州两地总和[13]。

（三）2012年至今：稳居全国十强县阵营

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被赋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使命（党丽娟等，2025）。这一时期，义乌将国家高质量发展要求与自身发展实际紧密结合，以数字化重塑传统比较优势，以要素双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数字贸易推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推动县域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2025年义乌GDP达到2693亿元，位列全国县域GDP前十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排名中，义乌跃居第4位[14]。

1.产业发展：数字化牵引产业体系能级跃升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推动全球贸易模式深刻变革，义乌产业发展的重点也从扩大市场规模、完善产业配套，逐步转向依托数字技术提升市场组织能力和产业协同水平。2013年，义乌成立全国首个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电子商务产业引导基金，推进“电商换市”工程。2020年，数字贸易综合服务Chinagoods平台上线，通过实时对接供需双方在生产设计、物流仓储、金融信贷等各环节需求，帮助用户便捷触达全球小商品。2025年，义乌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拓宽了义乌商品销售渠道，也增强了市场对全球需求信息的获取和反馈能力，使义乌市场逐步发展成为集交易、信息、供应链服务于一体的数字贸易平台。与此同时，数字化也推动义乌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制造企业能够依托庞大的商品交易网络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并通过数字化管理提高市场响应能力和产品开发效率。另一方面，义乌持续推动小商品产业集群优化升级，引导饰品、日用品等传统产业向设计研发、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市场贸易与制造体系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义乌“以市场带产业、以产业支撑市场”的发展模式。2025年，义乌电商交易额达到5537亿元；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超过千家，新兴产业规上产值同比增长30%，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9%[15]。

2.城乡融合：要素流动驱动双向赋能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义乌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取得明显成效，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县域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义乌城乡融合的重点在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推动城市资源向农村延伸的同时，注重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为重塑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义乌先后出台“1+X+Y”等一系列空间专项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方向并实施差异化改造，引导村庄分类优化布局，走特色发展之路。在空间重塑的基础上，义乌进一步推动市场资源、技术和人才流向农村。这一时期，农村不再主要依靠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实现发展，而是依托数字平台和创业生态主动连接市场。一批青年创业者进入乡村，将直播运营、网络营销等经营理念和方式带入农村，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部分村庄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有效盘活农村资源价值。城乡之间由过去“城市市场带动农村生产”的单向关系，逐步转向市场、人才、资本和信息双向流动的融合关系。到2025年，义乌培育出225个电商专业村，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电商村集群，2万余名村民融入电商产业链；343个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百万元，乡村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16]。

3.开放发展：开放格局全面升级

这一阶段，义乌依托综合性改革试点、开放平台建设和物流体系优化持续推动开放模式升级。制度创新方面，义乌于2013年创新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打通了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的通关堵点，大幅降低小商品出口的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2018年，义乌进一步开展市场采购进口贸易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打通了义乌“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贸易通道。平台建设方面，义乌先后获批中国（义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义乌综合保税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特别是2020年，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区，义乌被纳入扩区范围，成为浙江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体系方面，2013年义乌港升格为国际级内陆港。2014年义新欧中欧班列正式开通，开辟了直达欧洲的陆路贸易大通道，成为义乌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融入亚欧市场的核心枢纽。同时，义乌不断提升航空货运能力，并深化与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等沿海港口合作，持续完善多式联运的国际物流网络，大幅提升小商品全球流通效率。正是这一全面开放的格局，使义乌在全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同意〈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的函》，进一步支持义乌在完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推动进口贸易创新发展、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功能、推动完善跨境电商规则等方面先行先试。持续优化的开放布局与制度创新，推动义乌国际贸易规模稳步增长，贸易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近8万个商位汇聚210多万种商品，义乌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达到8365亿元，与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形成贸易往来[17]。

四、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经验

经过四十余年发展，义乌从资源匮乏的农业贫困县成长为产业繁荣、城乡协调、开放发展的全国强县，这源于其始终牢牢把握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与核心要求，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逐步确立自身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独特功能与比较优势，走出了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具体来看，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经验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以特色产业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

特色产业是指某一地区独有的、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通常而言，这类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独特性，能够在区域内形成产业集聚。县域资源禀赋有限，只有锚定特色、聚焦优势，培育打造符合自身条件的主导产业，才能逐步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当全国多数地区还在争论商品经济的性质时，当时的义乌县委、县政府就敏锐地认识到，允许和鼓励农民经商、兴办小商品专业市场，是激活当地经济最现实的选择。彼时各地正兴起办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工业的热潮。义乌的可贵之处在于尊重市场、尊重规律，没有简单复制其他地区“先工后商”的发展路径，而是顺应市场需求，立足当地深厚的商贸传统和擅长经商的人文优势，坚定选择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方向。从单纯的商品交易，到集展示、物流、金融、数据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义乌始终在“商”字上做深做透文章。依托大市场集聚的需求信息和渠道资源，义乌又通过“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带动本地制造业快速兴起。市场与产业相互支撑、双向赋能的过程既巩固了小商品集散中心的核心地位，也延伸补全了产业链条，形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良好格局。与此同时，义乌的实践也表明，产业优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适应时代变化、回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塑造和提升。在数字化浪潮下，义乌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出新的发展动能。

（二）坚持以城乡融合厚植县域经济发展底色

县域一头连接城市，一头扎根乡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义乌发展始终沿着“以工哺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的路径推进。从2003年制定《义乌市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将全市800个行政村整合规划为290个社区，有序推动农村、农民、农业向社区、市民、企业转型，到2017年提出“1+X+Y”布局体系统筹村庄规划，再到2020年率先出台城乡融合“义乌标准”，系统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义乌始终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四十多年来，义乌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于，以市场和产业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在提升农村发展能力的同时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共享。一方面，义乌依托商贸市场和制造业体系，将农村人口、土地和产业资源纳入县域经济循环，通过市场经营、小商品加工、物流服务等方式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推动大量农民逐步完成从商户、产业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另一方面，义乌持续推动公共

服务向乡村延伸、基础设施向乡村覆盖，不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同时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布局。如今，义乌农村催生出农村电商、直播带货、乡村旅游、文创工坊等各类新业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单向承接城市资源”到“城乡双向赋能”的转变，也让县域经济发展基础更加扎实、底色更加厚重。

（三）坚持以全面开放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

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18]。义乌的实践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跳出了县域经济本土化发展、“唯资源论”的思维窠臼，在开放发展中不断巩固和拓展自身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义乌便提出“依托市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主动抢抓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通过在全国各地设立义乌小商品配送中心、与国外城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布局海外仓和分市场，义乌持续延伸市场半径。“义新欧”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行，更将义乌与全球供应链紧密连接，使其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贸易通道。义乌的开放从不局限于商品贸易这一单一领域，而是涵盖商品要素、体制机制、地域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全方位、系统性开放过程。通过主动对接国家开放战略，义乌推动贸易监管、服务便利化等体制机制改革，为国际贸易创新探索了制度经验，也为自身拓展了开放发展的政策空间。全方位的开放发展，使义乌有力地摆脱了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的限制，为高质量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

（四）坚持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激发县域经济活力的重要保障。围绕县域经济发展，义乌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主动作为、顺势而为，为县域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一是尊重市场选择，充分激发主体活力。义乌小商品市场发端于群众自发的经商实践，地方政府顺应市场需求，以“四个允许”为农民经商提供制度空间。此后，从“贸工联动”到电子商务、直播经济发展，义乌始终注重发挥企业在发现需求、配置资源和创新业态中的主体作用，使市场选择成为产业演进的重要动力。二是回应市场需求，持续完善制度供给。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和发展阶段变化，义乌不断调整政府服务重点，从建设专业市场、完善交通物流，到争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再到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政府始终围绕市场发展中的公共性和制度性需求补短板、破障碍。三是保持战略定力，形成稳定发展预期。四十多年来，义乌始终围绕“兴商”主线持续推进，从“兴商建县”到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发展数字贸易，发展方向一脉相承、战略内涵不断拓展。稳定连续的政策环境增强了市场主体长期预期，最终形成了市场主体敢闯敢试、政府顺势赋能的良性互动。

五、义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实践启示

“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县域各展所长、美美与共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义乌四十余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县域经济的关键在于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和开放发展，构建起具有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对全国实践而言，要坚持遵循规律、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主动服务国家大局中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进入“十五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产业升级的主线。从义乌的实践来看，保持战略定力、构建比较优势，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同时，与时俱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是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面向新的发展阶段，各县域需立足自身基础与区域定位，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差异化产业格局。例如，工业基础扎实的县域，应推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农业禀赋突出的县域，应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农业、精深加工与乡村新业态；城郊枢纽型县域，则应集聚数字经济、科创服务、现代物流等高端业态。同时，各类县域都应主动融入区域

产业链分工体系，强化跨区域科创资源的协同导入，持续打造结构优化、特色鲜明、韧性充足的现代化县域产业体系。

（二）畅通要素双向流动，积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义乌的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并非简单让乡村向城市看齐，更不是将城市发展模式照搬到乡村，而是要以系统观念统筹城乡空间布局，盘活存量资源，通过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不断激发发展活力。进入“十五五”时期，城乡发展中人的因素更为突出。面对部分乡村、乡镇人口收缩的态势，各县域应坚持空间一盘棋的科学谋划，根据不同功能定位，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同时，要积极破除阻碍要素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一方面，畅通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完善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使农民能够自由选择发展空间，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和工商资本入乡监管服务机制，引导人才、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向乡村流动，并通过完善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将更多人才留在乡村、服务乡村，从而构建起城乡功能互补、要素双向赋能、发展互促共进的新型城乡关系。

（三）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塑造开放新优势

我国县域对外开放整体面临开放层次不高、开放载体不足、资源配置能力不强等问题。部分县域受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能力限制，对外联系主要依赖周边城市或传统贸易渠道，参与区域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能力较弱，难以吸引外部资源。与多数县域不同，义乌敢闯敢试、率先突破区位与资源局限，以市场开放带动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拓展开放空间，为资源约束型县域提升开放能级提供了实践样本。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进入“十五五”时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被摆到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各类县域应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深度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中强化自身竞争力。对基础条件较好、开放动能充足的县域，可升级打造国家级开放平台与跨区域产业合作载体，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开放发展新路径；对开放基础较弱的内陆县域，也可依托基础设施优化、平台共建等方式主动接入周边城市群、都市圈。与此同时，各县域还应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强与国内外市场的有效连接，推动本地特色产品、服务和资源更好融入更大市场，在开放流动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四）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县域经济活力的根源在于广大的市场主体和基层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核心在于把选择权还给市场、还给群众，让愿意创业、敢于创新的主体在公平竞争中成长壮大。从义乌的实践来看，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就是破除对市场主体的不合理限制，聚焦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补短板、破壁垒，真正让市场主体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进入“十五五”时期，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类复杂问题持续涌现。县域发展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避免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要健全群众诉求响应和首创经验吸纳推广机制，围绕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构建覆盖市场准入、研发创新、项目落地、合规经营、市场退出的全链条保障体系，以稳定透明、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创新风险、激发创新活力。应充分保护基层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对处于探索阶段、尚需实践检验的商业行为给予适度包容和支持，通过增强营商环境“软实力”，不断厚植县域经济发展竞争力。

注释

①《谱写“十五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新华网，https：//www.news.cn/fortune/20251122/062dcbf584d4412ab6035e5cf30876a9/c.html。②《2025年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发布：百强县经济规模稳中有进》，新华网，https：//www.news.cn/fortune/20250724/296c698bebe3418b923001928de3e9d2/c.html。③《领悟“义乌发展经验”的启示意义》，新华社，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4/content_7066779.htm。④《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4/content_7066680.htm。⑤《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央广网，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0318/t20250318_527104940.shtml。⑥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该战略调整为“兴商建市”，后文不做专门区分。⑦《中国第一集市——义乌小商品市场十年发展启示》，《人民日报》，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92/06/10/2/。⑧《二〇〇二年政府工作报告》，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art/2007/9/29/art_1229143244_1388848.html。⑨《义乌大步迈向现代化中等城市》，中国义乌网，https：//news.

zgyww.cn/system/2018/03/22/010125909.shtml。⑩《义乌机场通航 首航2/3是农民》，中国义乌网，https：//news.zgyww.cn/system/2015/06/30/010000495.shtml。⑪《第11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公布 河南6县市入围》，央广网，https：//hn.cnr.cn/hnfwcs/201108/t20110825_508415051_1.shtml。⑫《制度创新为“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中国义乌网，https：//news. zgyww. cn/system/2026/05/19/010301739. shtml。⑬《数万外国人在义乌的幸福生活》，中国义乌网，https：//news. zgyww. cn/system/2018/05/04/010129772. shtml。⑭《2025年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等榜单发布》，中国日报网，https：//qiye. chinadaily. com. cn/a/202512/04/WS693125f1a310942cc4994e67.html。⑮《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工作思路》，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col/col1229129448/art/2026/art_993be9e915864fc9974e31a49af53d78.html。⑯《义乌入选全国农村电商典型案例》，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art/2025/8/26/art_1229187636_59554577.html。⑰《2025年浙江义乌外贸进出口突破8000亿元》，《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s://paper.people.com.cn/rmrbhwb/pc/content/202601/19/content_30133435.html，2026年1月19日第3版。⑱《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参考文献

[1]魏后凯.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J].区域经济评论,2024(5):20-25.

[2]吴康,洪辉.县城人口流失:现状分析与治理重点[J].国家治理,2023(5):61-66.

[3]崔凯.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挑战与策略[J].经济学家,2025(7):54-64.

[4]涂圣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问题探讨[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6(1):1-10.

[5]蔡之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思路与制度保障[J].新视野,2025(6):51-60.

[6]张凤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理论探讨,2022(3):167-172.

[7]陆立军,杨海军.市场拓展、报酬递增与区域分工:以“义乌商圈”为例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4):67-78.

[8]刘成斌.活力释放与秩序规制:浙江义乌市场治理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4,29(6):197-220+245.

[9]陈锡文.当前推进乡村振兴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24(1):4-8.

[10]钟苏娟,黄贤金,贾铠阳.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模式:基于中国特色实践的一般性分析框架[J].中国农村经济,2026(5):24-44.

[11]党丽娟,黄征学,潘彪.县域经济政策:历史演进、地方实践、启示及建议[J].区域经济评论,2025(4):22-30.

The Yiwu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Developing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Xu Mengzhou Zheng Zhaofeng

Abstract: Developing county economi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is a central issue in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comprehensive, integrativ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economies call for coordinated efforts to build distinctive industrial systems, promot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e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Such development requires counties to buil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grounded in local realities while meeting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sus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rough synergy between well-functioning markets and proactive government. Drawing on its commercial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strengths, Yiwu has strengthened its distinctive industrial base by promoting manufacturing through commerce and fostering closer linkages between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It has promote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wo-way flow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equitable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overcome resource and locational constraints through market expans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timulated economic vitality by respecting market choices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services.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Yiwu has maintained strategic continuity while continually cultivating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t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dvancing high-quality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uit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foundations, facilitating two-way urban-rural factor flows,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respecting grassroots initiative, and continually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Counties should pursu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aths by drawing on their strength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Key Words: County-Level Economy; In Light of Local Conditions; Yiwu Experie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文 锐）